

## 父亲的自行车

父亲过世三十五年了一哦，已经这么久了！

我还清楚的记得，收到父亲病危(组织上担心我承受不了打击而故意隐瞒了父亲已经过世的消息)的电报时，我正在训练场地的汽车驾驶椅上练习——那是军校的一个基础训练科目。等我飞也似的赶回家时，父亲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我十九岁。

可能是过于久远的缘故吧，每每想起父亲，都是比较笼统、模糊的印象。较为清晰一些的画面，通常是父亲着一身肥大的军装，随便戴一顶老式军帽，穿一双黑色布鞋。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身材比较瘦弱——长期病痛折磨的结果——却喜欢穿过于宽大的衣服，通常是负二号的(老式军装正号的是标准体型的，负号的给体型较为肥胖的同志穿的)，使得他本就虚弱的躯体更显得弱不禁风了，特别是从后面观望的时候。更让人搞不懂的是，这样的病体，年轻的时候怎么会成为军校的篮球队队员，还是国家三级运动员呢？而随身携带的喷雾器——一种用于扩张气管的药品——经常拿出来缓解一下因肺部呼吸不畅而急促喘息的压力，就成了他晚年——实际上也才四五十岁——的标志性动作。

但一想到父亲，不知为什么就总会联想到我家的那台自行车，或者一想到那台自行车就自然的与父亲联系在一起，甚至有时看到与其相似的或者老式的自行车，也会莫名其妙的咯瞪一下，好像作了病似的。那台自行车，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就是一款女式坤车，飞鸽牌的，大弯梁，二六架，绿色的车身，应该是五十年代的产品。这样的车子放到现在，应该很普通，不显眼儿，但在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品牌屈指可数的时期，还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它的口色。而就是这样一辆女式车，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至少在整個的文革时期，大约十几年光景吧——成了父亲的“座驾”。

实际上，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父亲骑这辆自行车的画面。如果有的话，想想也一定很滑稽。你想啊，一个正值壮年但瘦弱的军人，穿着肥大的军装，骑着一辆女式的绿色的弯梁的坤车，迎着寒风、酷暑，也可能是雷雨、晨昏，长年穿梭在城乡凸凹不平甚至经常泥泞不堪的道路上，到街道，到工厂，到机关，到学校，到困难群众家里……那一定是一道挺有意思的风景。

而就是这样一道挺有意思的风景，还真的出现过呢。那些父亲的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的回忆，那些周围的老邻居、老朋友、老同志的叙述，就这么一点点的让这个风景丰满起来、展现出来，时间久了，就变成了恒定的画面，深深地固化在了自己的脑子里，变成了一个对父亲永久的回忆。记着前些年，许多老同志还健在的时候，我去看望他们，或者在一个什么场合遇见的时候，总是会很感慨的说起父亲当年的故事，特别是父亲拖着病体风里来雨里去的故事——当然是骑着那辆自行车了，言谈间时常流露出尊敬怀念的神态。往往这时，一种既自豪又敬仰还心痛的复杂感受油然而生。

这样的风景还不止是听人叙述、停留在故事里呢。印象里，在我的少年时代，大约也就是父亲工作的那个阶段，这个车子曾经有过几次丢失的经历。也可能是着急忘了上锁，也可能是她独特的风姿比较吸引小偷，但不管咋说，都应该是父亲不太小心的结果，没准还是他得罪了谁呢。但我觉得几次丢失，不小心，或者太放心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就说我家吧，因为没有锁门的习惯，曾经几次被一个残疾的邻居钻进去过，甚至有一次还恰巧被我碰上，而正上初中的我，还鼓足了勇气严词训斥过这个窃贼呢。事后却发现自己的衣服都湿透了，好怕哦。父亲唯一的一套将校呢军

服,就是被这个人窃走换钱花了,太可气了!可回想一下,那时又有几家是锁门的呢!特别令人神奇的是,车子每次都能很快找回来,或者送回来,其中的一次还是派出所的同志直接送回来的呢。大约是说,有一天警察叔叔抓到了一个偷,赃物中包括了一辆自行车,赃物运回时正巧派出所的一位同志看到了,说是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一审问,一回忆,一证实,一拍大腿,妈呀,这不是张政委的车子吗!立马给送了回来。那年头,警察真好啊!还有一次,一个叔叔路过我家,对母亲说,我在哪儿哪儿哪儿看到一辆自行车,倒在路边,像是你家的,让孩子去看看,应该没错。又有一天傍晚时分,几个大人唠嗑,一个长辈不经意间对母亲说,下午我在哪儿哪儿哪儿看到你家老张了—实际上是看到了自行车。回头母亲顺口问了一句,父亲说是啊,我去哪儿哪儿哪儿了。看来,不仅现在有名车,几十年前就有啊—父亲的自行车不就是“名车”吗?

我确信,记忆中那样的风景真真实实发生过,而不仅存在于大家的传述里,或者失而复得的有点传奇色彩的故事中,更不仅仅是自己的久远的模糊想象。还清楚地记着一个夏夜,母亲带着我,可能还有哥哥吧,时间久记不太清了,手里拎着一包东西,大约是罐头水果点心之类的吧,走了挺远的路,也可能根本不远,只是因为年纪小感觉远吧,挨家挨户问了几家,才在一个比较拥挤、破乱的街区,把那包东西死乞白赖地送还给了一个阿姨。母亲说,父亲听母亲介绍这个人的困难后,就帮了这个人的忙,人家非要感谢,这才有了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次“还礼”经历,也多了一点对父亲母亲的了解和认识。大哥有一次动情的说:“咱爸病危时特别叮嘱他抓紧去办三件事,其中的一件事就是让他去一个街道的办事处,把二块多钱和大约一斤多粮票亲手交给食堂的管理员……交待后的第三天父亲就过世了。”在父亲即将走完他坎坷曲折、色彩斑斓的一生时,可以想像会有多少难忘的经历、如烟的往事、并肩的战友、不舍的亲人涌入脑海,齐聚心头,但让人没有想到、很难理解的却是这样一件常人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让他耿耿于怀、死不瞑目!在他心中的天秤上,竟是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大事小事的份量!父亲很少在外吃饭。听一位父亲的老同事讲,你父亲从来不参加宴请,即使单位年终总结表彰或者节日聚餐之类的活动,他也是会议结束或者安排完了就回家吃饭,从不参加。听着都有点不可思议或者难以接受,觉得好像过了吧,有些不近人情的感觉。但讲述的人并没有传达这样的意思,甚至是满脸钦佩的表情。这样的故事大约听过几次,不同的人讲述。也可能这样的事正是大多数人没想到或者难做到吧,人们才会有这样深刻的记忆。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党的好干部就应该不太一样吧。父亲瘦弱的身躯,原来这样伟岸!

父亲在的时候,很少有强烈意愿听他讲自己的事,等到有强烈的想了解父辈经历愿望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遗憾是永远的!但多多少少知晓一些他早年的经历,也算是一点弥补吧。比如他少年时就参加了老家河北青县一个村子里的儿童团,14岁就参加了县大队—冀中平原的一种准抗日武装,作为县委的通信员,经常参加袭扰驻地日伪武装,配合主力作战的战斗行动。16岁就积极要求参加了正规的抗日武装。而令人惊奇的是,父亲竟然没有当过战士,一参军就是干部,同时就入了党—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我军的征兵历史上也是非常特殊和罕见的。据说父亲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完全得益于县大队领导们对父亲英勇表现和出色能力的高度肯定和大力推荐。父亲不仅打过小日本,还和《敌后武工队》里的汉奸“高铁杆”打过仗呢。这样说来,父亲好像就是小说里的武工队了,好神奇呀。比如他参加过朱德骑兵师,一人两匹马追击土匪的时候差点没了命—一个顶替他观察位置的战友上来就牺牲了。特别光荣的是,父亲还曾参加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国庆阅兵呢。作为政治领队,父亲带领东北公安部队代表队方队,昂首阔步行进在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比如他曾带着几个人长途跋涉抓过逃兵,把逃兵抓回来了,但带着的人中又有人跑了,可见当时的斗争环境多么恶劣,坚定理想信念多么不易。但不管多么严峻的场面多么艰苦的岁月多么险恶的处境,在父亲的言语中,都没有流露出悲观的情绪,都没有感到苦难,更没有抱怨,

甚至也没有一句牢骚或者委屈，就好像没有那么险恶似的。这样一来，从父亲身上传递出的，即使非常艰苦的战争岁月，也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沉重艰难的记忆感受。这种情绪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我 16 岁参军后，不管劳动训练站岗，不管多苦多累多难，也没有像有些同志表达的参军有多不容易多么难以忍受。这可能就是受父亲乐观情绪感染熏陶的好处吧。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不仅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印象中也只是叙述事实或者战斗经过，没听他说过自己多么勇敢多么坚强，或者自己起了多大作用做出了多少贡献。这恐怕也是父亲的许多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都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或者只能通过旁证来证实的缘故吧。有时我想，默默工作从不表白是不是也是父亲的可贵之处呢。

在部队工作时，有机会在军区档案馆里看到了父亲的档案。在厚厚的陈旧的卷纸里，几个评价的词语反复出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德佳，品德好，品德优秀……

哦，原来父亲骑自行车的风景是从这里一路走来的啊。

2017. 6. 23



父亲，张荫萱，河北青县人，汉族，1927年12月26日生，1982年11月16日故。1942年加入抗日县大队，1944年5月加入抗日正规武装，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干事、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副教导员、营政治教导员、人民武装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等职。先后在冀中抗日武装部队、朱德骑兵师、步兵第166师、辽宁省军区等部队工作。解放前，参加过抗日敌后作战、辽沈战役、内蒙古剿匪作战、平津战役、南下作战等。解放后，作为辽宁省军区代表队政治领队，率队参加过天安门国庆阅兵；曾就读于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1955年授予大尉军衔，1961年晋升少校军衔，1982年因病离职休养。